

# 跨越鸿沟：为什么美国需要对多元主义更加自信？

约翰·稻津（John Inazu）

纵观古今的文化冲突，恐怕我们很难找到像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和拉里·弗林特（Larry Flynt）这样截然相反两个人物。福尔韦尔（去世于 2007 年）曾是美南浸信会的牧师，也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保守主义基督教政治组织“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的创始人。弗林特则是《好色客》（《Hustler》）杂志的创始人，并且是一位色情行业大佬。福尔韦尔把发生在 2011 年的 9.11 恐怖袭击归罪于“异教徒、堕胎者、女权主义者、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以及“美式生活”（American Way）的拥趸——这些人都在试图使美国世俗化。”与此同时，弗林特则在曾经呼求上帝让一个保守的新闻主播患上脑动脉瘤，好让他痛苦煎熬地死去<sup>[1]</sup>。

这两个人并没有太关注过对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尔韦尔多次谴责弗林特的行业。弗林特曾说：“他用了任何可以想到的字眼来骂我，在我看来，这些字眼和我杂志里面出现的那些词一样脏。”弗林特最终被惹怒了。1983 年，他借用当时很流行的金巴力酒的广告，播出了一个针对福尔韦尔的滑稽模仿秀。这个广告里有一个双关语，代言人把第一次喝金巴力酒与第一次性爱经历的感觉相提并论。弗林特在他的滑稽剧里用福尔韦尔的腔调讲，他的“第一次”是跟他自己的老妈搞，“醉到找不到自己虔诚的屁股”。在这个闹剧里，福尔韦尔解释说：“老妈看起来比那些捐 100 美金的浸信会妓女好多了。”还声称他之所以要和老妈搞，乃是因为她让全镇子里的男人都找到了乐子。弗林特得寸进尺，在福尔韦尔的布道里还插了一句话：“我总是在讲道之前喝醉，难道你觉得我能在清醒的时候给你们讲那些狗屁不通的东西吗？”<sup>[2]</sup>

弗林特的嘲讽闹到了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终裁决弗林特拥有播出这出滑稽剧的权利。这场诉讼自始至终都充满了争议。<sup>[3]</sup>在弗林特的证词里，福尔韦尔的律师质询这出滑稽剧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损毁福尔韦尔的名誉，而弗林特直言不讳的回答道：“就是要他身败名裂”<sup>[4]</sup>。

## 多元主义的终结？

法国哲学家卢梭曾说：“和那些我们认为被诅咒的人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福尔韦尔和弗林特看起来是正好应验了卢梭的这个可怕的预言。我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例外。从密苏里州民权运动中的冲突，到俄克拉马州反穆斯林以及其他种种文化冲突导致的抗议运动，看起来我们难以与那些我们认为不理智、不道德甚至危险的人一起生活。

有时候我们的争论会被过度夸张。想想在 2015 年 3 月由印第安纳州宗教自由法而引发的激烈争论。保守派电台主播马克·莱文（Mark Levin）坚决主张，凡是反对这一法律的人都“憎恨美利坚”。美国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的主席托尼·博金斯（Tony Perkins）则

主张“任何对宗教自由法的改变都会摧毁印第安纳州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苹果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夸张地声称，此法律很危险，它会使“种族歧视神圣化”和“不平等合法化”。而记者本·科普斯（Ben Kepes）则担心此法律更像是另一个“水晶之夜”的预兆<sup>[5]</sup>。

具体的法律争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某些基督徒花商和面包店主（显然，还有一个不幸的披萨店）拒绝为同性恋婚礼提供服务这种行为是否合法。这并不是个小问题，并且对于争论双方来说是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我们并不值得用过度夸张的方式来解读这一政策的取舍——或者做出任何有关那种夸张口气所隐含的预言。

有时候我们对其他人的反感无法用语言形容。2012年，北卡罗来纳州通过了一个修正案，使得此州对于“婚姻只指男人和女人的结合”的定义宪法化，并使得其他形式的“法律意义上的家庭结合”无效。这项修正案潜在地影响了家庭法、家暴法、不动产购置以及员工福利中对男女同性恋者的保护<sup>[6]</sup>。

2014年阿拉巴马州投票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禁止州法院适用违反州或联邦法律的外国法律。这项修正案——主要由于那些对伊斯兰教教法的入侵而产生的恐惧——并没有任何法律意义；正如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保罗·霍维茨所说，从现存的法律来看，这项修正案完全是多余的。但是它并不是没有象征作用，反而是利用了反穆斯林的敌意来吸引更多的人去投票。与此同时，已经有三十多个州正在考虑类似的修正案或者立法<sup>[7]</sup>。

如今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许多保守主义宗教学生团体在许多公立学院或大学里不再受欢迎了。而这不仅仅是发生在西岸的现象。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和许多其他的学校已经逼迫这样的团体离开校园。这些学校采取“通收”政策（all comers），要求学生团体承认任何有意愿参与的学生成为会员甚至是领导者，比如共和党俱乐部必须接受民主党人，支持堕胎的社团必须接受反堕胎者。那些对于成员与领导者资格设限的保守主义团体并不能满足这一政策的要求，所以学校对这些团体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要么改变，要么离开<sup>[8]</sup>。

尽管我们中有些人在努力和其他人和平共处，其他人却通过忽略或轻视我们之间的迥异来假装一致。我们虽然举行会议、参加集会、签署声明来表达团结一致，然而我们中大部分人其实并不认为我们之间的差异那么容易跨越；并且大部分人并不真心期待百花齐放。我们所有人都会主张，有些事物如果不存在这个世界会更好。当涉及道德问题以及终极信仰时，这显得尤为正确。我们可能更喜欢一个这样的社会：每个人在什么是正当杀人、中庸性情或者美好生活上都有一致的看法，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真正生活的社会。

有另外一种选择可以使我们对深层差异的现实：自信的多元主义。多元主义主张卢梭是错误的：共存不仅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要的。自信的多元主义提议一种更温和的选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多样性中共生，而不是“合众为一”这个难以捉摸的目标。它不需要盲目乐观地幻想我们会解决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反，它要求我们求同存异。

## 宪法承诺

自信的多元主义是以双重前提为基础的，即在法律和社会层面我们有共存的可能。我们可以单独就宪法承诺和公民实践来考虑这些可能性。宪法承诺使我们可以和平相处的同时，又保留一些有价值的区别。一篇知名的文章中曾提及过这一点，在这篇文章中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为耶和华见证人在二战中拒绝宣告效忠誓言（Pledge of Allegiance）的权利进行了辩护：

“然而，我们根据《宪法》的限制规定行事，毫不担心实行思想与信仰多元化甚至对立的自由可能会导致社会解体。与他人不同的自由并不限于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如果与他人不同的自由仅仅局限于琐事，那么自由就将仅剩一张外皮。真正能够检验出这种自由的东西，就是对触及现存秩序核心事务持不同意见的权利<sup>[9]</sup>。

坚持异于主流的权利比任何一种观点和信仰都重要。19世纪40年代，耶和华见证人遭遇了爱国主义的挑战；60年代民权团体坚决反对关于黑人的主流看法；80年代同性恋团体开始挑战异性恋的主流地位。而如今这些主流观点再次改变，但我们还是保留区别于大众的权利。这种保留区别权利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能够对由我们生活中广大政治团体和志愿团体所构建起来的标准说不。我们必须站在那些准则的对立面。正如法官威廉姆·布伦南（William Brennan）所强调：“代表共同目标的集体努力”对“保留政治、文化多样性和保护不同意见的言论不受多数人打压是极其重要的。<sup>[10]</sup>”

提出异议并不是不受限制的，每个社会都会对它施加一些限制，但在这些限制中，有时候保留区别的权力意味着市民以及他们组成的团体不会接受政治共同体设定的常规标准，他们可能是非自由主义者或非平等主义者，他们也可能忽视自信多元主义的公民实践。一个无法使这种异议权变得光荣的政治共同体不能被称为是多元化的，它缺少对多元化的自信。

保护这种有别于大众的权利，落实宪法对这种多元主义的承诺需要在三个方面对宪法原则进行重新定义和重新理解，即结社权，公共论坛和公共资金。

## 结社权

自信多元主义最重要的宪法承诺乃是，它重新激励对公民社会中志愿团体的协同保护。最高法院首次在宪法意义上承认结社权是在1958年11月<sup>[11]</sup>。26年后，最高法院将结社权划分出了两层含义：“私密型结社（intimate association）”和“公开型结社（expressive association）”<sup>[12]</sup>。私密型结社体现了结社权的本质特点，它们关注于“高度的个人关系”以及“深度接触和交流”。虽然这听起来很有前景，但实际上，私密型团体的扩展对象仅限于亲密的家庭关系，并且几乎无益于我们公民自由的平衡。<sup>[13]</sup>

至于公开型结社的权利，只有当一个组织团体的目标和活动有益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涉及第一修正案时，它才能够得到宪法的保护。公开型结社使结社权更加具有社会功用，它必须具有某种显见的重要目的。这确实有效地忽略了人们实际形成信仰，进行实践以

及反对这种制度的方式，也就是选择那些可以促进友谊，情感关系和团结的非正式，甚至非公开型的集会。

限制非公开型结社的法律几乎不会面对任何宪法阻碍，这种法律只需要通过一项“合理基础”的审查，可这几乎是所有法律都需要通过的审查。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州或者地方政府规定某个团体成员的要求与主流标准不一致，如果某个被选举的官员想要推进公共秩序或推动任意地区的偏好，亦或是如果执法人员想要进行群体管控而限制团体的规模或成员构成，那么持守非公开型的志愿团体就可以被控制。

此外，那些被认为是公开结社的组织也被一种模糊的原则性框架限制着，这一框架十分轻松地便可使宪法保护失效。比如，针对一些公开结社的司法裁决明显毫无同情心可言，这些裁决以性别问题或该结社的其他问题为由对结社成员加以限制。<sup>[14]</sup>但事实上无论如何结社权的部分内容都会导致歧视，有意义的结社权应允许志愿团体拒绝接纳一部分人。威尔斯利学院

（Wellesley College）不接收男性和来自艺术高中的学生；摩门教唱诗班拒绝非摩门教徒和声乐能力差的人加入其中。身处于公民社会的志愿团体中，我们忍受着各种在其他地方不被允许的歧视行为。而关于结社权的现行法律并没有区分出这一特征。

## 公共论坛

宪法保护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对公共论坛的保护。公共论坛，即市民聚集起来，提出异议，发表意见和表示不满的现实和虚拟的场所。公共论坛可以是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地点，如市政厅；但也可以是一些非现实的或虚拟的场所。公立学院和大学允许学生成立他们自己的社团来组建公共论坛；地方政府在网站上征求意见时也会建立公共论坛。

公共论坛对我们的民主化尝试是极为重要的。它为市民集会，表达并且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实践机制，使市民可以用自己的声音，以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关心的议题。公共论坛这一构想代表了健全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表示着对异议，不安和不稳定的容忍。这些直观的联系在热播剧《公园与游憩》（Parks and Recreation）的编剧笔下也有所提及。一个来自委内瑞拉公园及娱乐部的代表团来到一个虚构的印第安纳州的波尼小镇，代表团领队劳尔看到公共论坛时感到很惊讶：“真是太不像话了，怎么没有武装人员来把这些抗议的带走？武装人员都哪去了？这在波拉瓜（Boraqua）（波尼的友好城镇）根本就不被允许。你要是像他们那样喊，就会立刻被关进监狱，连审讯都没有。我们还有专门针对记者的监狱。”<sup>[15]</sup>

我们还不至于相信劳尔所说的。最近陷入迈克尔·布朗之死余波（以及拘留掩盖抗议者的记者事件）的弗格森市所施行的公共论坛限制只是我们国家侵害公共论坛的其中一例。在现行法律下，政治抗议者在公共论坛中常常被肉体隔离或被戏称为“自由言论区”。在公共领域劳动纠察员往往遭到严重的打压。教会禁止租用普通的公共设施。纽约城市公园占领运动的抗议者，科罗拉多州人行道上的反堕胎议员以及北卡罗莱纳州府的政治抗议者们全都被那些越权管事的政府官员打压下去。现实中的公共论坛与其本身的初衷已相去甚远，而这种偏离应该让我们停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 公共资金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是怎样的意识形态，我们都可以设立广泛可用的公共资金。政府有权按照其目的来使用税收收入。但是，如果考虑到某些类似于公共论坛功能的情况，如由公立大学的学生组织的论坛，政府就不能以不提供公共资金支持的要挟来强迫他们遵循当前盛行的正统观念。

另一个例子是联邦税法规定的税务豁免。<sup>[16]</sup>符合免税资格的组织数量十分庞大，我们所有人都会认为有些组织获得免税资格无可厚非，而另一些则被我们认为对社会有害而不应具备免税资格。当然，我们列举的应受谴责的团体会有所差异，如支持人工流产合法化的组织和反堕胎的组织；各种宗教组织；狩猎组织和动物权益保护组织——不管怎样，这些组织都受益于联邦免税律法。一些左派或右派团体发出愤怒的呼吁，要求剥夺与其政治光谱相对立的团体的免税权，然而这种呼声常常被误导。我们不能以自信的多元主义为前提，然后又想尽办法驱逐自己不喜欢的群体。

## 作为公民美德的自信多元主义

自信的多元主义的某些方面是超越法律范畴的，它取决于我们自己。当然，我们可以为那些宪法承诺的重要性辩护，却忽略我们生活中各种承诺之下的潜在行为规范。然而，最好的方式还是把对于法律的热情反映在自己的生活方式里面

为了使公民实践成为可能，自信的多元主义有三个强烈的诉求：容忍、谦恭和耐心。但这三个诉求并非像看上去“那么合理”，相反，我们可能会把他们看作是由于缺乏信心而作出的让步。实际上，正是由于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有足够的信心，才能在这极度差异化的环境中与人友善地相处。

在自信的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容忍、谦恭和耐心是一种功能性诉求，它还没有转变成一个精确的哲学概念。但若足够多的人都持有这三个强烈的诉求，即便我们选择折中主义或吸收了先前的思想，我们依旧可以在自信的多元主义中维持一种共识。“我们虽然同意规范，但关于这个规范为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可能会产生分歧。不过，我们依旧满足于生活在这种共识中”。<sup>[17]</sup>

回顾福尔韦尔和弗林特，我们可能会把福尔韦尔称为保守的道德家。他遵循一套来自环境或所属共同体的规则来管理和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规则告诉了他何谓正确与错误。弗林特则可能被我们称为自由的进步主义者。他渴望当代自由主义语境下的自主权，这样的“自主权”就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不受环境或共同体的约束而自由地作决定，跟随自己的热情，无论它将带你去何方。福尔韦尔和弗林特在有关宗教信仰和性的话题上有极大的分歧。他们二人都是白种男性，同性恋，年龄和收入也很相近。换言之，他们之间的差异虽然很明显，但如果考虑现实世界中有助于实现多元主义的各种因素，问题会变得更复杂。

大多数人并非都像福尔韦尔或弗林特，如“保守的道德主义者”和“自由的进步主义者”这样简单的标签没有完全回答我们之间的差异问题。但是，福尔韦尔和弗林特反映了我们对待一些现今最具争议的文化问题的方法。因此，他们将有助于我们探索自信的多元主义的三个诉求。

## 容忍

容忍是自信的多元主义最重要的诉求。它意味着接受真正的差异，包括深刻的道德分歧。要实现这个诉求是很不容易的。正如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所指出的，当人们发现他人的信仰或习俗“实在是不可接受”或“是一种不敬的、灾难性的、甚至猥亵的错误”时，容忍是最需要的。威廉姆斯指出，容忍的基本困难是，我们只是在“无法容忍”的时候才需要容忍。<sup>[18]</sup>

但是，容忍并非意味着我们要接受所有的信仰或观念，并认为他们都是好的、对的。哲学家爱德华·兰格拉克（Edward Langerak）提醒我们，“容忍源于拉丁语中的宽容，它的主要意思是对某事物的持久性包容”。注意到它的内涵，我们应该将容忍与漠不关心、顺从、胆怯和同意区分开来。<sup>[19]</sup>我们不应该追求一种“怎么样都所谓”的乐天派的容忍，而应追求一种为实现彼此共存而真实可行的容忍。福尔韦尔和弗林特所持的是一种从根本上就互相对立的世界观，这样的深度分歧不可能达成类似于彼此同意的结果。从语法上解析容忍和同意之间的区别需要大量的努力，因为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想法来解释。因此，我们不应低估这项工作的难度。容忍要求福尔韦尔尊重弗林特，但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尊重弗林特的观点。自信的多元主义并不强迫大家同意所有的观点都是有效的或在道德上是无害的。为了公平地对话、讨论，容忍确实要求我们尊重别人，并允许大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持不同的意见。

## 谦卑

谦卑比起对于他者的宽容来说需要更多的自我反思和自律。它使福尔韦尔和弗林特认识到他们自己的信念和直觉是建立在传统所依赖的价值观之上的，这些价值观是不能凭经验证明或者完全由这些传统以外的理性形式来证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福尔韦尔和弗林特就一定要怀疑他们的信仰或者对他们自己的信念缺乏信心。相反，谦卑提醒着我们，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深层的价值观是具有有限度的，而证明它们则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谦卑以我们证明能力的极限**，而并非对于何为真的主张为基础。因此，它不应该被误解为是相对主义。谦卑产生了存在对与错，善与恶的可能性。谦卑并不影响我们对真理的信心，但是它要求承认我们的信念常常是以有争议的、**其他人不分享的为前提**。福尔韦尔关于“道德”的概念和弗林特对于“自主性”的概念源于某些传统和习俗，但它的基本前提并非所有人或民间社会的自愿团体都支持的。

谦卑也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人类的能力在本质上是有限的——我们思考、理性和反思的能力很少是完美的，它是有限的，导致了我们有错误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在日常生活与行为中都具有某种依靠信心的成分。正如神学家莱斯利·纽比金（Lesslie Newbigin）所指出的，“我们不断地被要求对不可证明的信念采取行动，并将我们的生命献给可以怀疑的主张。”<sup>[20]</sup>

## 忍耐

忍耐包括节制、坚持和耐力。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福尔韦尔和弗林特都深刻地认为他们在这种方式上是正确的。他们大部分生活的结构都伴随着他们的道德承诺，他们也经常想要自己的规范性观点在其他社会观点上能占上风。但是自信的多元主义承认对话和劝说常常是要花费时间的。相反地，缺乏忍耐往往让位于压迫，甚至是暴力。

我们大多数人需要用耐心去了解存在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分歧，蹒跚着越过那些难以战胜的距离。有时，我们需要用耐心来忍受我们无法克服的差异。忍耐也鼓励我们努力地倾听、理解，甚至是移情。这些行为与接受或拥护另一种观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会发现，忍耐引导我们更深地认识到相反信仰的邪恶或堕落。然而，至少我们可以采取某种姿态，在我们听清楚对方要讲什么之前避免那些可笑的误解。

忍耐并不总是意味着被动。在某些情况下，当我们在世界中面对我们认为的邪恶和不公时，我们会迫切要求采取行动而不是无动于衷。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忍耐这一美德意味着节制、坚持和耐力。即使福尔韦尔和弗林特可能厌恶对方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忍耐却要求他们忍受彼此的存在。忍耐所持有的这种耐力可以实现更好的理解和移情。

## 信仰多元化所扮演的角色

人们常常在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中表现出宽容，谦逊与耐心的精神。在个人层面上为种种差异搭建沟通桥梁已经颇为困难，更不用说，我们在沟通公共机构的分歧上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这种在公共机构之间斡旋的困难在国家层面上尤为严重，相比之下，地方性质的合作关系或许更加容易实现。

一个案例发生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Portland)之间。2008年春，一个叫做凯文·帕劳(Kevin Palau)的福音派信徒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对本城福音派基督徒的认识更多基于他们反对什么，而不是他们支持什么。他联络了波特兰市长萨姆·亚当斯(Sam Adams)，而这位市长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为了寻找与本市市民团体建立联系的途径，帕劳决定去做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他向亚当斯市长询问宗教信徒能为城市做些什么事情。<sup>[21]</sup>

亚当斯市长虽然并不是特别喜欢福音派信徒，但是他却需要志愿者来帮助应付波特兰市的教育、环境和医疗需求等方面的问题。虽然他知道福音派将他的性取向视为犯罪行为，但是为了整合人们来帮助这个城市的缘故，他决定将这个矛盾置之一旁并开始这一合作。于亚当斯市长而言，最根本的挑战是要克服我们已经习惯的那种思维方式，即如果我们与某人的观点不一致，那么我们必然互相憎恶。因此，摆在亚当斯市长和帕劳面前的这一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双方能否在一些事情上产生分歧的同时又在另一些事情上共同合作？”

在亚当斯市长和帕劳首次见面三年后，根据ABC新闻的报道，有26,000个来自500所当地教会的基督徒正在帮助这个城市处理各种问题，比如翻修公园，为性人口买卖受害者提供帮助、为流浪者提供食物等等。<sup>[22]</sup>有一间教会致力于帮助一所叫做罗斯福中学(Roosevelt High School)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低收入有色人种家庭的孩子。正如《纽约时报》

(New York Tiems) 在 2013 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评述到的：在整个学年里，位于富裕的西溪谷区 (West Linn) 的南湖教会 (SouthLake Church) 会友们以做家教的方式来服事罗斯福中学。其中有一个名叫尼尔·罗马克斯 (Neil Romax) 的会友帮助训练了该中学的橄榄球队，他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前四分卫成员。另外南湖教会的一个名叫希瑟·哈吉特 (Heather Huggitt) 的 26 岁的年轻人也参与到这次的帮扶事工之中，他在罗斯福中学做全职工作，解决那些在物质上短缺的学生的需求，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食物、衣服和学习用品。<sup>[23]</sup>

帕劳和亚当斯都颇为重视在处理这些问题上跨越异见的合作的重要性。亚当斯不仅强调了教会领袖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协同关系，还强调了每个教区会友个体和政府公务员之间协作的重要性。亚当斯并没有忘记他和帕劳之间的关键差异，但是他也不想这些差异阻碍他们达成共同目标。帕劳在这点上和亚当斯市长达成了共识，2014 年，他在和亚当斯的一次公开对话中讲道：“确切地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所有的东西上都能达成共识，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寻找那些共同点。我们所关注的都是一个更加宜居的波特兰市。<sup>[24]</sup>”波特兰市的这一案例乃是基于寻找共识，而不是试图解决那些深刻而令人痛苦的差异。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关于通过寻找共识来跨越差异的案例，它旨在确保自信多元主义的宪法承诺。2000 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支持一项被认为“内容中立”的规制，它对于科罗拉多州反堕胎者在堕胎诊所外面的公共道路人行道上抗议时可以使用的言辞和表达方式进行了限制。<sup>[25]</sup>在这其中有一条异议，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 (Anthony Kennedy) 认为，最高法院的这一决议传达了一种未经辩护的核心政治观念，即便它“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在一个深刻的伦理议题上，向公共人行道上的同胞公民”表达自身。<sup>[26]</sup>

四十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再次裁决了一起涉及到堕胎诊所外公共人行道上反堕胎抗议者的案子。这次的案例发生在马萨诸塞州。<sup>[27]</sup>马萨诸塞州这次在麦考伦 (McCullen) 诉科克利 (Coakley) 案上的议决的限制比科罗拉多州更加严厉。他们将任何两人或超过两人以上在堕胎诊所外公共人行道上的聚集定义为犯罪。<sup>[28]</sup>他们还阻止原告埃莉诺·麦考伦 (Eleanor McCullen) 使用堕胎诊所外面的公共人行道来唱歌和默祷。

如同最高法院的许多案例一样，麦考伦案掀起了一场关乎多个法律理论领域的诉状风暴。很多支持原告的诉状都引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特赖布 (Laurence Tribe) 对最高法院这一裁决的断言：“这一判决像一次灌篮那样简单，也像一次灌篮那样错误。”<sup>[29]</sup>在诉状里向最高法院引述特赖布教授的这句话并非引用本身而变得非同寻常，特赖布教授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法学家，大多数的法官在他们的学生时期都曾受教于他。但在这个案例中是什么使得他的话语变得如此重要呢？其原因是特赖布教授同时还是一个坚定的堕胎权的拥护者。

这种非比寻常的联盟并没有就此结束。美国劳工联盟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和美国产业工业联合会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提交了一份“非当事人意见陈述”，他们认为这一对于路边抗议的规制是违宪的。上述两组织的诉状引述了大量劳工问题判例，这些判例支持一个富有活力的公共论坛。除此之外，它还强调了美国公民在大街上通过游说，散发传单以及其它受到保护的表达方式传播他们的观点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他们的一项重要的权利。<sup>[30]</sup>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Stanford Law School）的教授迈克尔·麦康奈尔（Michael McConnell）和我以若干宗教组织的名义合著了一份非当事人意见陈述。<sup>[31]</sup>我们的观点是：马萨诸塞州禁令介入公共论坛和合法集会违宪。我们还组成了一个多个宗教组织之间的联合，而其中某些成员仅有些微共通之处。天主教主教会议（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南方浸信会的宗教自由委员会（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国际克里希纳知觉者团体（克里希纳教派）（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这些团体并不是每天都能和睦共处。然而它们（还有很多其它的团体）都参与了我们的上诉，而且即便出于不同的关注点，它们都承认公共论坛的重要性。

2014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这条马萨诸塞州立法。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它促使我们对于更有意义地保护公共论坛更接近了一点。纽约时报刊登了特赖布教授对这次裁决的称赞：“我是否赞同麦考伦女士的意见并不重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巨大价值乃是，它在保护我们所认同的言论的同时也一样有力地保护那些引起我们激愤的言论。”<sup>[32]</sup>

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出来的几天后，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地方法官根据麦考伦案撤销了十多位对于“星期一道德”（Moral Mondays）的抗议者的刑事指控。这些抗议者最近的行为已经对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构成了挑战。<sup>[33]</sup>这些抗议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进步主义者，他们其中有些人曾是“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组织的成员，为了支持堕胎权而加入了“星期一道德”的抗议者队伍。同样地，这些人也得益于对公共论坛的保护。这正是宪法对信仰多元化的承诺试图达到的结果；正是如此，在麦考伦案中，各种思想不同的人和组织在这一原则下找到了彼此共通之处。

## 收剑入鞘

杰里·福尔韦尔在2007年5月15日去世了。他去世五天后，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弗林特和福尔韦尔曾经一起参加拉里·金（Larry King）的节目，弗林特回顾了金巴利酒恶搞事件之后一个惊人的转折。在这个节目中的某个环节，福尔韦尔俯身给了弗林特一个尴尬但明显真诚的拥抱。此后不久，福尔韦尔出人意料地拜访了弗林特的办公室：“我们交谈了两个小时，在我桌上整齐堆放着最新发行的《好色客》，这正好在他前面。他建议我们去全国各地辩论，然后我同意了。”下面是弗林特在福尔韦尔死后对他的悼念词的总结：

在随后的几年，直到他去世，他每次到加利福尼亚都会来看我。我们之间会有有趣的哲学对话，也会交换个人的圣诞卡片，他还会给我看他孙子的照片。曾经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在佛罗里达州，他抱怨他的健康和体重，我建议他去节食，这对我也是起了作用的。我回到家之后，就传真了一份节食计划给他的妻子。

事实上，这位牧师和我有许多共同点。他来自弗吉尼亚州，我来自肯塔基州。他的父亲是一个走私者，在我20岁进入海军之前我也是一个走私者。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对话远离政治，但是宗教是在交谈范围之内的。他想要让我得到救赎，并决心让我离开“这个行业”……

他肯定是做贩卖上帝怒火的那种宗教的生意的，而且他愿意为了增加他邮件列表中的成员做任何事情。但是到最后，我知道他在卖什么，而且他也知道我在卖什么，我们找到了沟通的

方法.....

我永远不会敬佩他的见解或评价。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在电视节目里的那个拥抱的目的是什么，究竟是为了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向公众展示自己是一个慷慨和宽容的传教士，还是仅仅为了让我不安，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期望过的，就像我赢得了著名的最高法院案例（Supreme Court case）一样令人震惊：我们成了朋友。<sup>[34]</sup>

凭心而言，福尔韦尔和弗林特不太可能是自信多元主义的模版。但是，如果他们都可以领悟宽容、谦卑和忍耐的精神，那么或许我们也能够做到这一点。

约翰·稻津（John Inazu），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副教授。这篇文章改编自他的书《自信多元主义：通过深度差异的幸存与繁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即将出版。

转自《刺猬审查》（The Hedgehog Review 17.3）（2015年秋季刊）。未经书面许可，本出版物不得转售、转载。要作任何形式的转载和重新分发，请联系《刺猬审查》（Hedgehog Review）了解更多详情。

## 尾注：

---

- [1] 比尔·福尔曼，“一周候选人：《好色客》拉里·弗林特 vs 色情女演员玛丽·凯莉”《萨克拉门托新闻与回顾》（2013.8.14）；马克·安宾德，“福尔韦尔认为同性恋群体应为袭击负责”ABCNews.com（2011.9.14 引自福尔韦尔）
- [2] 福尔韦尔与弗林特之间的相关细节摘自罗德尼·A·斯莫拉，杰里·福尔韦尔诉拉里·弗林特案：宪法第一修正案受审（纽约，马丁出版大街，1988.）以及拉里·弗林特：“我的朋友，杰里·福尔韦尔”《洛杉矶时报》（2007.5.20）
- [3] 《好色客》杂志公司诉福尔韦尔，485U.S.46（1998）
- [4] 玛丽·芭蒂阿塔，“‘感觉在流泪’福尔韦尔向朱尔倾诉”《华盛顿邮报》（1984.12.5）
- [5] 加比尔·阿罗娜，“同性恋群体恨恶美国和指向印第安纳州的右翼言论”《赫芬顿邮报》（2015.4.3，引自马克·莱文）；家庭研究会“宗教自由不应被挟持为大型公司的人质，家庭研究会要求否决”（2015.4.2 通讯稿）；蒂姆·库克“赞成对宗教自由法的歧视是危险的（2015.3.29）”《华盛顿邮报》；本科普斯“Salesforce.com 表示反对偏执”Forbes.com（2015.3.26）；乔恩·希利“反对抵制印第安纳新宗教自由法”《洛杉矶时报》（2015.4.2 文章描述了“记忆”披萨（Memories Pizza）店主在回复记者提问时表示他不会为同性恋群体婚礼提供服务后遭到威胁和抵制）
- [6] 北卡罗莱纳州宪法第 14 条 § 6；大卫·祖奇诺“对于婚姻法修正案的投票使得全国都在关注北卡罗莱纳”《洛杉矶时报》（2012.5.5）E·格雷戈里·沃伦斯认为：并非每个人都赞同修正案的潜在影响，“北卡罗莱纳州婚姻法修正案的意义与法律作用”；美国大学性别社会政策与法律期刊第一期（2013），在这份期刊中，沃伦斯表示反对对尚未发生的可怕结果进行预测，并且这些结果就不会发生。2014 年在美国基督教会性别宗教大会诉 Resinger 的案件中，联邦地方法庭判决北卡罗莱纳对于同性婚姻的禁止行为是违宪的。12 F.Supp.3d 790 (W.D. N.C. 2014).

- 
- [7] 格雷格 加里森, “阿拉巴马州法庭通过了禁止外国法律的修正案; 将会添进阿拉巴马州宪法”AL.com (2014.11.4); 保罗 霍维兹“第一修正案是无用, 浪费且错误的”AL.com (2014.10.30); 利兹 法摩尔“阿拉巴马州加入了禁止外国法律的浪潮中”Governing.com (2014.11.4)
- [8] 迈克尔 保尔森“大学与福音派在政治偏见中产生对立”《纽约时报》(2014.6.10) A1 版
- [9] 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巴纳特案 319 U. S. 624, 641-42 (1943).
- [10] 罗伯特诉美国青年商会案, 468 U.S. 609, 622 (1984).
- [11] 全美有色人种协会诉阿拉巴马州案, 357 U.S. 449 (1958).
- [12] 罗伯茨, 609.
- [13] 最高法院最近在伯格菲尔诉霍奇斯案中提及了私密型社团的权利 135 S. Ct. 1039 (2015). 伯格菲尔错误地将之前的一个案例-劳伦斯诉德克萨斯州案 539 U.S. 558 (2004) 形容为对私密型社团的信赖。劳伦斯否决了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 478 U.S. 186 (1986). 鲍尔斯一案激起了两种异议, 一方是约翰 保罗 斯蒂芬法官, 他强调实体性正当程序; 一方是哈里 布莱克穆恩法官支持了私密型社团。劳伦斯选择了斯蒂芬法官的意见, 并此后不再提及私密型社团。
- [14] 罗伯茨, 609; 基督教法律协会
- [15] 艾伦 杨“姐妹城市”《公园与游憩》(NBC 电视节目) 第二季第五集, 导演迈克尔 舒尔, 2009 年 10 月 25 日播出
- [16] 见 26 U.S.C. § 170(c) (2006), 授权扣款; 26 U.S.C. § 501(c)(3) (2006), 明确提出免税组织可以收回扣税额。
- [17] 查尔斯 泰勒: “关于人权的非强迫性共识的条件”, 《困境与关联》(剑桥, MA: 贝尔纳普出版社, 2011), 105
- [18] 伯纳德 威廉姆斯, “容忍: 一个不可能的美德?” 容忍: 一个难以捉摸的美德, 戴维海德 (普林斯顿, NJ: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6), 18
- [19] 爱德华 朗格拉克, 公民分歧: 多元社会中的个人诚信 (华盛顿, 乔治城大学出版社, 2014), 78
- [20] 莱斯利 纽比金, 正确的信心: 信仰, 怀疑和对基督门徒训练的确信 (大急流城, 威廉 B 伊尔德曼斯出版公司 1995) 102
- [21] 这个部分的叙述摘自凯文 帕劳 (Kevin palau) 和萨姆 亚当斯 (Sam Adams) 的一次视频对话。参加“救赎主从城市到城市” (redeemer city to city) 波特兰市案例研究: 凯文 帕劳和萨姆 亚当斯, 有效地址: <https://vimeo.com/66596545>.
- [22] 丹 哈里斯 (Dan Harris) “为了慈善的福音派团体和波特兰的同性恋市长”, ABC 新闻在线, 2011.12.25; 有效地址: <http://abcnews.go.com/US/evangelicals-team-portlands-gay-mayor-charity/story?id=15218876>
- [23] 塞缪尔 G 弗里德曼, “为俄勒冈州的一所公立学校需求买单的福音派 (非传福音性质的)”, 纽约时报, 2013.8.9
- [24] “救赎主从城市到城市”(“Redeemer City to City.”)
- [25] 科罗拉多之诉 (Hill v. Colorado) 530 U.S. 703 (2000).
- [26] 同上, 765 (大法官肯尼迪的异议) (Kennedy, J., dissenting)

---

[27] 麦考伦诉科克利(McCullen v. Coakley), 134 S. Ct. 2518 (2014)

[28] 马萨诸塞州法第 266 条, § 120E½(b)

[29] 劳伦斯 特赖布 (Laurence Tribe) 援引“学术研讨会, 迈克尔·威廉·麦康奈尔 (Michael W. McConnell's) 教授的回答”, 28 《佩珀代因大学法律评论》 (Pepperdine Law Review) 747, 750 期 (2001)

[30] 麦考伦 (McCullen), 美国劳联和产联的法庭之友意见书, 支持原告埃莉诺·麦考伦, 1; 有效地址: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publications/supreme\\_court\\_preview/briefs-v2/12-1168\\_pet\\_amcu\\_aflcio.authcheckdam.pdf](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publications/supreme_court_preview/briefs-v2/12-1168_pet_amcu_aflcio.authcheckdam.pdf). Accessed July 20, 2015.

[31] 麦考伦, 美国拉美裔基督教领袖会议等的法庭之友意见书, 支持原告埃莉诺·麦考伦, 有效地址:  
[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publications/supreme\\_court\\_preview/briefs-v2/12-1168\\_pet\\_amcu\\_nhclc-et-al.authcheckdam.pdf](http://www.americanbar.org/content/dam/aba/publications/supreme_court_preview/briefs-v2/12-1168_pet_amcu_nhclc-et-al.authcheckdam.pdf). Accessed July 20, 2015.

[32] 劳伦斯 H 特赖布, “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反堕胎抗议的正确性”, 《纽约时报》, 2014.6.26

[33] 安妮·布莱斯 (Anne Blythe) 和约翰·弗兰克 (John Frank) “堕胎限制反对者们身着粉色参与到‘周一道德’的努力”, 《新闻观察报》 (News and Observer) (雷利·北卡罗来纳州), 2013.7.8. (注意: “珍妮特·克莱 (Janet Colm),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部计划生育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同时也是超过 60 个被捕者中的一员”); 安妮·布莱斯 (Anne Blythe) 法官裁决驳回‘星期一道德’ (Moral Monday) 案可能产生的箭形效应 (Sweeping Effect)”。《夏洛特观察报》 (Charlotte Observer), 2014.8.4

[34] 拉里·弗林特, “我的朋友, 杰里·福尔韦尔”, 《洛杉矶时报》, 2007.5.20.